



外国语与文化

系刊

外国文学与文化

翁义钦 主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插页2张 264,000字

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0404-2/G·115 定价：4.35元

目 录

上 编

文学与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回归

.....	许汝祉	3
西方近代文学与西方六大文化心理.....	林亚光	38
共同意识与西方文学现象.....	宣树铮	59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与文化.....	智量	75

下 编

希腊神话与英美文学.....	常耀信	91
印度神话传说与文学.....	刘安武	104
希伯来文化与世界文学.....	朱维之	131
西方现代文学中的“原罪说”.....	李燕乔	149
现代派文学与非理性主义.....	熊玉鹏	162
当代英国文学与存在主义.....	刘玉堂	182
欧美文学与道德.....	翁义钦	193
左拉的自然主义与生理学.....	王秋荣 周颐	211
弗洛伊德主义与东西方文学.....	王 宁	232

西方文学与音乐	陈 东	252
外国文学与新闻学	时 波	275
语言学与文学、文学研究	张连奎	286
勃兰兑斯与文化批评	王艾明	306
托尔斯泰与文化	雷成德	314
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钱林森	329
后记		361

上 编

文学与文化：马克思主义 文学观念的回归

许 汝 社

阐明文学的本质与文化的关系，指明文化对文学的重大影响，这只不过是还事物以本来面貌，是还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本来面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回归。

（一）二十世纪世界文坛需要文化学说

当前世界文坛，学说纷纭，学派林立，可谓色彩缤纷，使人目眩神迷。而细加考察，它们都各有贡献，又都招来了西方学术界的不满。这些不满，集结之点在哪里呢？怎样才能得到匡救呢？

新批评从三十年代起流行了三十年，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它的贡献是积极的。但是，它的从文学到文学的文学观念，不仅遭到了世界进步文坛的公允的批评，就连西方严肃的学者象接受美学、文化学派等等，也都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它的偏颇。英国颇有影响的里查特·霍迦特在《当代文化研究》(1979)中对新批评提出

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重要的是至今仍有若干批评家依然坚持一个文学作品是一个自足的艺术品。”“不过，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有局限的和错误的主张。”“一个艺术品，不论它如何受到社会的拒绝或者漠视，它总是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之中。它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世界上根本没有‘为艺术而艺术’这回事。”^①霍迦特还郑重声明：“我在这里对之持异议的那种文学观念，如今最容易找到，又是说得简明晓畅的，可在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第九章中找到。”^②这是说得很公正的，至于韦勒克另一部有名著作《现代批评史》，在我国以及西方，和《文学理论》一样，颇有影响，也遭到了公正的批评。美国杰弗里·L·萨蒙斯在《文学社会学的威胁》中说：“总体而言，现代批评并不否认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韦勒克的《现代批评史》“这部著作始终一贯地敌视文学与批评受外部因素决定的任何主张。”^③转引这些批评并非旨在抹杀韦勒克以至新批评的相当大的贡献。^④只是表明其偏颇之处也是客观存在的。其弊病所在，除了其他方面外，正在于看不到文学根本是文化，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深受文学以外其他文化领域的重大影响，又极大地丰富了文化（当然也受到经济、政治的制约）。看不到这个实际，就不免会在某种程度上丧失现实感。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消解结构说，从六十年代末产生以来，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界的注意，我国也开始进行研究。这些文学批评学说（结构主义不仅是文学批评学说，它对哲学、政

① 参见玛尔康·勃拉特勃雷和但维·巴尔玛《当代文学批评》，伦敦，1979年，第163页。

② 参见施特卡尔《文学批评与社会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译文载《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第403页。

治、语言学、人类学等都有较系统的主张)固然都有某种贡献，但据笔者浅见，它们从语言到语言中心论，发展到极致，可说到了大语言主义的地步，几乎否定了文学作品的生活内容，也几乎否定了文化。法国的托多罗夫的名言是“作家所做的无非是研究语言。”^①法国的罗朗·巴特则说“无论从哪方面看，文化都是一种语言，”^②他们在字面上也提到文化，实际上文化已丧失了特定历史、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含义。有的美国学者看到了结构主义的局限，象杰弗森与罗比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这本较近的著作指出，“这种文学批评方式所关心的是产生意义的方法，而不是意义本身。”“这使人想起美国新批评派、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批评方法抛开了所有内容的问题。”^③至于德里达这位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消解结构者，其文学批评主张的特色之一，仍认为“文本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东西。”其另一特色是，“消解只是对它的对象(文本)提出质疑。”象德里达评论卢梭作品时，运用了消解结构，企图证明卢梭写的东西实际上与他想要说的大不一样等等。因而德里达的消解结构是以“质疑”的形式出现，企图寻找的是文本语言的逻辑，而不是作者观点的逻辑。^④这些学说，离开了作者，离开了生活的内容，离开了文化，自然引起西方一些学者特别是文化学派的异议。

二十世纪中提倡以生命、意志、意识、潜意识为中心的种种学说，象柏格森、尼采、弗洛伊德等等的主张，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产生了强大的冲击。由这些学说产生的文学观念，都有不

① 参见杰弗森与罗比《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美国巴恩斯与诺布尔公司1982年版，第88页。

② 参见杰弗森与罗比《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第94页。

③ 同上，第96—97页。

④ 参见杰弗森与罗比《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第107—110页。

同程度的积极意义，但其致命伤恰恰在于基本上无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會文化给这些生命意志、潛意识等以重大的影响。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例，它对西方的积极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其消极影响也是为人们广泛耽心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产生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修正主义派，即文化学派，包括弗洛姆、汤普逊等。此外，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尔库塞企图把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也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加以修正。弗洛伊德的弱点在于唯生物主义，把人的本能、意识、力比多、潛意识基本上看作永恒不变的。譬如认为远古人类曾有杀父娶母现象，便将此引伸为永恒的人性；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便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俄狄浦斯。受弗洛伊德影响的奥尼尔则认为美国南北战争后也有俄狄浦斯一类性格，从而写出了《伊勒克特拉的丧父之痛》（或译《哀悼》）。如此以讹传讹，引起了文学史上的一场灾难。于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修正主义学派，即文化派站出来指出弗洛伊德的偏颇，认为社会心理现象“这种本能机制本身，在许多重要方面是一种生物学事实，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可变的；而首要的转变因素便是经济条件。”^①马尔库塞指出，文化学派把重心“从过去移向现今”，从“生物学层次转向文化层次”，从“个体的构成转向其环境”。马尔库塞还引了文化派代表人物克莱拉·汤普逊的话：

“只有通过文化经验才能成为一个人，社会创造了人的新的需要。……属于这一类的有正义、平等和合作等观念。……大规模的战争和对不幸者的无情的剥削就是文化

^① 弗洛姆《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任务》，转引自马尔库塞《爱欲和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

的若干破坏性产物。一旦破坏性因素占据统治地位，我们就遇到了一种孕育着战争的状况。”①

文化派这样的分析，对于尼采、叔本华、柏格森以及在他们以后崇尚意志、生命、意识、无意识的种种文学观念，应该说是完全适用的。从上面对二十世纪各种文艺思潮的简要回顾，可知需要文化学说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响彻西方学术界的各个角落。可见二十世纪各国文坛多么迫切需要有关文化的文学观念的匡救与滋养！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与文化学说的回归

当今世界文坛正需要文化学说的匡救与滋养，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呢？是否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正呼唤着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学与文化学说的回归呢？

苏联学者鲍戈留博娃在1980年发表的《文化与文明》一文中指出，“文明和文化这个概念的情况是：它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使用过的概念，但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好象退到了次要地位。下列事实即可为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根本没有研究文化与文明的问题。”②在文艺领域里也是如此，几十年来，是政治决定着文艺的一切。这样的文艺固然过去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其不良后果已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在中国也大体如此。

① 克莱拉·汤普逊：《精神分析：进化和发展》，转引自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86页。

② 鲍戈留博娃：《文化和文明》，载《文明和文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132页。

关于文学的本质以及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论述中，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文学是作家“按照美的规律”、艺术地“掌握世界”的产物，其掌握方式与政治经济学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即它需要通过形象思维来掌握世界，通过艺术家这样的主体发挥主体性来掌握世界。

二、作家和其他领域的工作者一样，其掌握世界的 worldview、艺术思维以及文学观念、创作方法、艺术技巧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已有的传统出发。（《反杜林论》）

三、关于经济与政治、道德、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关系“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恩格斯致海·施塔尔根堡》，1894）。这个“决定意义”是指经济条件“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

四、“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经济基础。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原因”（恩格斯致海·施塔尔根堡》，1894）。可见，从恩格斯的论述中，得不出政治是唯一对文学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样的结论。这样的作用，除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外，与政治一起对文学起重大的“中介”作用的还有道德，即人们惯说的“价值标准”、“是非善恶”、“真善美”、“假恶丑”，而这些恰恰正是“文化”的重大因素，对文学的重大影响，几乎可与政治等量齐观。此外，宗教、哲学、艺术（以及其他要素，譬如说象教育等等）对文学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又互相影响。

五、恩格斯虽然在这里没有正式使用“文化”这个词，但实质

上，他是明确地指出了文化对文学的作用。道德、哲学、宗教、艺术，（还可包括教育、社会风尚等等）这些连同文学，都是文化领域的活动。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还明确提到了行为与思想观念的传统问题。他说：“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这个“传统”，按照一般的解释，联系上下文，当然可以包括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传统。而这些要素，和道德、哲学、宗教、艺术以及教育等等，也同属于文化活动。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最关心的是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科学、技术也同样属于文化活动，与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并给予文学以强大的影响。

六、一个国家的民族心理、社会心理等也会对文学发生极其重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这方面的论述是很多的。象恩格斯致恩斯特的信中，比较论述了易卜生和挪威文学的繁荣以及同时期德国文学的一度停滞。他说，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他们比起堕落的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与德国小市民相比有着天渊之别。“德国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恩格斯致恩斯特》，1890）。恩格斯论歌德的文章里也曾酣畅淋漓地分析了德国的社会心态等等。而这些都是重大的文化现象。

值得指出的是，有的西方著名学者引述恩格斯的光辉论述时，直接用“文化领域”这样的词汇。德国的民主主义者、社会学派阿诺尔德·豪塞在其名著《艺术社会学》中曾深入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和各种上层建筑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坚信一定时期的所有文化结构(cultural structures)具有同一个经济基础……但也承认各个文化领域(cultural areas)及观念结构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具有这样相对的自治性质，主要是因为每一个文化区域(cultural sector)都有自己的传统来确定其规范，并且它的发展无不牵涉到它的技术手段和已经获得的成就。”①

文化结构处在不同的精神平面上，因而与其经济基础的距离也是不同的，这样的观念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原理中找到。恩格斯在人们常常引述的有关费尔巴哈的论文中……认为宗教、哲学、艺术作为文化中最为心灵化(spiritualized)的形式，具有差异性最丰富的内容，较之自然科学，其与社会经济基础(的距离)较远。……恩格斯称宗教、哲学、艺术为‘更高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艺术’，不论从历史上或者心理上说，都不能说它总是通过‘较低’的中介形式象法律、政治与风尚习俗(customs)而与当时的经济基础发生联系。”“在旧石器时代，从经济到艺术之路完全可以是更直接的。”②

从以上引文，可见称哲学、宗教、艺术等等为“文化”，是完全符合恩格斯原意的。笔者愿意在这里郑重补充的是：恩格斯看作与政治一起成为重大“中介”因素的道德，正是文化要素中特别

① 阿诺尔德·豪塞：《艺术社会学》，伦敦，1980年，第194页。

② 阿诺尔德·豪塞：《艺术社会学》第199—200页。

重要的要素，正是作家们安身立命的所在，因而它对文学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这些文化要素、文化生活、文化活动与文学发生相互作用，对文学发生强大的影响，乃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本质论中固有的内容。古往今来的文学史都证明了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表述。由于种种原因，几十年来，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文学观念，一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结果是使文学、文化、政治都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可见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上，不是应该大声呼唤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回归么？

（三）文学史与文化学说

西方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大致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其缺点是始终未能跃进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十八世纪的狄德罗便已引进了“关系”说（“美在关系”），但仍缺乏明确的社会与文化的含义。

普列汉诺夫曾盛赞十九世纪初法国的斯塔尔夫人把社会制度影响文学这个观念，开始引进到文学批评中来。据笔者浅见，她还把社会风尚影响文学这样的观念引进文学批评。普列汉诺夫在著名的《没有地址的信》中，除了指出斯塔尔夫人提出民族性格对文学的影响外，特别指出：

“斯塔尔夫人说：‘在法国新的政治制度下（指十七世纪以后的新的政治制度——引者），不管这是个什么样的制度，我们也不会看见什么类似（十七世纪文学）的东西，这将清楚地证明所谓法国人的机智和法国人的优美，不过是法国存在许多世纪的君主制度和习俗的直接的必然产物’。这个新的观点，即认为文学是社会制度的产物，

逐渐地在十九世纪欧洲批评界中占据了统治的地位。”^①

斯塔尔夫人还只是文学批评中社会学派、文化学派的比较自发的先导。比较自觉地在文学史研究中重视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还是泰纳。几十年来，中苏学术界往往对泰纳指责多于切实的研究。泰纳自有其弱点，但他提出决定性地影响文学发展的三原则：种族、环境、时代，包括社会风尚、社会心理、民族性格等文化要素，其贡献不可磨灭。

普列汉诺夫盛赞“泰纳坚决地保持着这个信念：‘人们的境况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心理的变化。’”任何一定社会的文学和艺术恰巧是由它的心理来说明，因为“人类精神的产物，正如活的自然的产物一样，只能由它们的环境来说明。”又说：

“批评泰纳的人们中间甚至没有一个人能够动摇一下这个归纳了他的美学理论中几乎全部真理的论点，这就是：艺术是由人们的心理创造的，而人们的心理是随着他们的境况而变化的。……当泰纳说人们的心理是随着他们的境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时候，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可是当同一个泰纳说人们的境况是由他们的心理所决定的时候，他是在重述十八世纪唯心主义的观点。”^②

把社会环境(并没有单指政治)决定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决定创作的学说，引进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远远超出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众所周知，心理与道德(价值观念)是紧

①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I)，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7页。

②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I)第348、350页。

密联系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厌恶，正是作家创作心理的主要内容。

泰纳不仅把社会状况、社会心理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观念引进文学，而且还引进了社会风尚、时代精神、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社会的与文化的要素，强调它们对文艺的影响。这不是为文学观念、文学批评开启了新的时代么？与古希腊以来的前辈们相比，不是更贴近生活实际与文学实际么？

十九世纪后半期丹麦的勃兰兑斯，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六卷本的作者可说是在欧洲把进步的文化学说引进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引进作家和流派研究的第一人。当年普列汉诺夫和鲁迅都很赞赏勃兰兑斯。勃兰兑斯的著作连同普列汉诺夫所加的批注，收藏在普列汉诺夫的图书室里。他认为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第二卷《德国浪漫派》对德国浪漫主义者的情绪的特点，有着很出色的说明。

勃兰兑斯自称他这部作品的中心内容是谈十九世纪头几十年对十八世纪文学的反动和这一反动的被压倒。用韦勒克的话说，在这本书中，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是正题，王政复辟是反题，自由运动是合题，用的是黑格尔式的思维方法^①，这也不无道理，只是说得抽象了一些。《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特色是把十九世纪前半个世纪的文学史看成有规律性的文学变迁的过程，其中轴则是与政治相联系的思想文化运动中进步的与保守以至反动的文艺思潮流派的斗争。这样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即与思想文化紧密联系的两种文学的学说为纲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在勃兰兑斯以前的世界文学史上恐怕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① 韦勒克：《现代批评史》，第4卷，纽约，第357页。